

## 江海洋： 吴导当年，决心极大

习惯了多厅豪华影院、国外引进大片的观众，也许很难想象90年代初简陋的电影环境——拷贝有限要靠人力运送，电影院没几家还不都是多厅的，海外引进分账大片的时代尚未到来，普通观众能接触到的只有国产片。

但当时已有不少中国导演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荣誉——谢晋的《芙蓉镇》在西班牙巴利阿多里德国际电影节、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、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多项大奖；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；而吴贻弓导演的《城南旧事》获得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——中国电影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。

吴贻弓导演获奖时，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也才刚刚创办到第二届。因为时常受邀参加其他国家的电影节，他心头一动：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诞生地，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国际电影节呢？

“90年代初，全亚洲只有一个A类电影节：东京电影节。”吴贻弓导演的学生、著名导演江海洋告诉记者，“当时的上海，经济发展大踏步前进，处处敢为人先；文化方面反而受到束缚，步子迈得不大。而吴导始终有一个信念：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助推，是一股强大的力量。”

后来吴贻弓导演谦虚道：“他们都说搞搞搞，那就搞起来了。”但其实哪有那么容易。先要向国家广电部报批，再争取市政府支持，



上图：  
吴贻弓和江海洋。  
供图 / 江海洋

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的“国际A类电影节”，还必须经过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（FIAPF）的审核。而当年电影市场远不像现在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票仓，也难免有一些“轻电影重电视”的声音，觉得上海已经有了白玉兰电视节，有必要再办电影节吗？

“只有做电影的人最清楚，电影是七大艺术之一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电视。”江海洋记忆中，办电影节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经费欠缺，“吴导到处‘化缘’求赞助，他甚至会问：实在不行先借一点，有了钱再还上。当时市场经济还远不如现在发达，找商家赞助也不容易。那么多环节，哪怕是任何一关稍微松懈一点，电影节也就办不成了。但是吴贻弓没有一刻打过退堂鼓，可见是决心极大”。

## 江平：每天一元钱饭贴， 一干就是几个月

2002年，吴贻弓在《中国电影导演系列丛书·灯火阑珊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电影节，这是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。……

1993年，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，我和我的同事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摸索和努力，终于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。两年以后，举办了第二届，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我为这个电影节倾注了我的全部精力。回想起那时候曾有过多少不眠之夜啊！”

这些不眠之夜，也被吴贻弓的另一位学生、著名导演江平——见证。

“1993年，我陪他出差赴北京，汇报上海电影节筹备事宜，我俩到早了，也走累了，就坐在广电部门口人行道的花坛边上等。他烟瘾很大，想抽，可看看周围没有垃圾桶，只好掏出香烟闻闻又放进烟盒。晚上，我们住在中影的招待所，两人一个标准间。他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，按级别可以住五星级宾馆，可他不同意，说电影节没钱，省一分是一分。语气很淡，很平常。”江平写道，“记得那次在中影的招待所，我一屁股将他放在床上的眼镜腿给坐折了，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。第二天一大早我陪他去中宣部，来不及找地方去修，他又是高度近视眼，我就找了一根橡皮筋给缠了一下，他苦笑笑，也就这么戴着它去见了领导。”

申办获批以后，大家拿着每天一元钱的饭贴，一干就是几个月。“每天，他跟我们一样在地下室的食堂凭饭菜票排队就餐，偶尔到自己管辖的影城三楼餐厅打打牙祭，来碗面条或者馄饨，而且从不‘签买单’，往碗底下压上十块钱走人。有时候像张瑞芳、孙道临那样的老前辈来了，他会让食堂给加个荷包蛋，然后自己掏钱为老同志买单。”江平忆道，“那时候我们这些手下的人，